

《治乱警鉴》编委会

主 编:赵禄祥

副 主 编:(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兰锁	田人隆	刘汉章	刘合安
李世愉	李学东	李惠文	杨祥峰
武四海	范英俊	林吉旺	郑宝兴
饶江山	徐步章	翁殿璧	黄晓东
商 传	梁洪心	谢保成	滕福泉

编 委:(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长林	王兰锁	王怀志	王培真
田人隆	田文峰	史卫民	刘汉章
刘合安	刘 驰	刘洪波	孙丽丽
孙忠恕	李世愉	李学东	李雪屏
李惠文	杨万新	杨中国	杨祥峰
吴德发	武四海	范英俊	林吉旺
岳会仁	郑宝兴	孟世凯	赵禄祥
饶江山	徐步章	翁殿璧	高俊华
黄晓东	商 传	梁洪心	谢保成
蒋福亚	赖长扬	滕福泉	薛秉义



C 404655

序 言

赵禄祥

赵禄祥先生主编的《治乱警鉴》，是他主编出版的《国史镜鉴》的姊妹篇，也是他运筹谋划编撰“中国历史三鉴”的第二部史鉴巨著。作为一名领导干部，在繁忙的政务之余，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长期认真地研究中国历史，努力弘扬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遗产，为国家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系统地总结提炼出可供资政、资治的历史经验，受到社会和史学界的肯定，被特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其良苦用心和勤奋努力，无疑值得加以鼓励和支持。当初我曾应邀为《国史镜鉴》作序，这次又应邀为《治乱警鉴》作序，自然是不能推辞的。

我们党历来重视和提倡各级干部读一点历史。那是因为读史可以使我们懂得社会发展的

客观规律,可以为我们修身、齐家、创业、建国、安天下提供多方面有益的借鉴,使我们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变得更聪明一些。世界上哪个国家能有我们这样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文化遗产呢?这是祖先给我们留下来的极为宝贵的财富。但是,我们的干部不可能像史学家那样去阅读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因此,就需要将历史的经验、教训加以精选、提炼和分析,使人们不仅能够更加方便地阅读,而且能够从广博中把握要领,从简明中窥视全貌。应该说,赵祿祥先生在这方面作了很好的工作。

中国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从政治角度来看,“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①,也可以说就是一部治乱相继、治乱更迭、治世终究取代乱世的历史。治和乱是一个对立的统一体。有乱就有治,大乱而后有大治;而治世之中也不可避免地会有各种致乱因素。关键在于究竟哪个方面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取得主导地位。纵观中国的历史,显然治世是历史的主流。人民群众对治世的渴求是实现治世的社会思想基础,政治家孜孜求治的努力,则是实现治世的关键。从夏、商到明、清的几

^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1页。

千年间,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一次又一次为人所称誉的太平盛世,诸如汉代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治”、明代的“仁宣致治”、清代的“康乾盛世”等等,都曾是中国历史上的辉煌时期,至今仍令国人引以为骄傲。因为治世带来的是社会的繁荣和稳定,是生产的发展,生活的改善;而乱世所带来的则是社会的动荡,生产的破坏和人民的苦难。这是与生活在同一时代中每一个人休戚相关的大事。因此历代正史、野史中不乏对治乱的记述。但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从治、乱的角度分析中国历史,编撰一部专门讲述中国历代治乱的历史著作,此前似乎尚未有过,更不要说像这样一部数百万字的巨著。况且《治乱警鉴》所要探求的还不仅仅是历代治乱的过程和现象,而是力图透过这些现象找出造成治或乱的历史原因。正因为如此,它才真正给人们提供了历史的借鉴。我想这也正是赵禄祥先生主编这部巨著的价值所在。

在中国历史上,造成治、乱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这里面有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但是毋庸置疑,人的因素在其中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在

强调客观规律作用的同时，也充分肯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固然是时势造英雄，但是“如爱尔兰维修所说的，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①当然，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有过英雄气短，群丑辈出，人民遭殃的时候，那往往也便是社会动荡败弊的时期，是中华民族的悲哀时刻。值得庆幸的是，每当人们呼唤治世，渴望拨乱反正的时候，中国总有那么一批脊梁，肩负起社会的责任。这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资本。我因此想，了解与治世乱世相关的历史人物的活动，读一读他们与治和乱的关系，可能比读治、乱事件的本身更有借鉴作用。这好比是照镜子，我们的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都不妨去照一照这面镜子，看一看在时逢盛世的今天，作为一名领导干部，到底应该如何总结和记取历史人物的成败得失和经验教训。

读治乱而后知警。人们在研究和探讨历史经验的重要性时，经常引用唐太宗的一句名言，

^① 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72页。

即“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① 这部《治乱警鉴》中，既有古事可供我们“知兴替”，又有古人可供我们“明得失”，可以说同《国史镜鉴》一样，是又一部极富教益的好书。它以大量生动的史实警示我们：每一个领导干部都应以维护治世，警避乱世，确保我们国家的长治久安为己任、大任，一刻也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和懈怠。特别是地方和基层的领导干部，更要看到自己肩负的责任，真正做到为官一任，保一方平安。因为基层恰恰是社会稳定的基础。为此，一要居安思危。要看到我们今天的治世来之不易，而维护和发展千秋万代的治世，则更需要一代一代地继往开来，披荆斩棘，坚持不懈地努力。所以必须“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②。二要反腐倡廉。历朝历代，政治清明，官员廉洁，社会就稳定；政治昏暗，官员贪黷，社会就动荡。所以必须惩治腐败，整肃风纪，廉洁自律，防微杜渐。三要选贤任能。从一定意义上说，治世在于人，乱世也在于人。贤能之人可以创业、强国，而奸庸之

① 《旧唐书》卷71《魏征传》。

② 《周易·系辞下》。

徒则会误事、祸国。所以必须任贤用能,排奸贬庸。四要勤政为民。而勤政为民就要兴利除弊。所谓兴利,就是要做对社会发展有利的事,做对人民有利的事。除弊就是除掉那些不利于社会发展,不利于人民群众的事情。社会发展进步了,人民群众心情舒畅了,国家就安定,就会有治世。所以必须爱民、为民、利民,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五要富国强兵。国家要求治,当自立自强,才能外御敌侮,内防不测。历史上积贫积弱的时代是不可能有的。所以必须创业富国,足食强兵。六要革新求治。也就是要顺应历史发展的需要,不断改革创新,不断前进。墨守陈规,不求进取,是没有出路的,而且往往也是酿成乱世的一个根源。所以必须科学谋划,大胆实践,敢于破除前进中的一切艰难险阻,从改革中开创出一条光明大道。当然,《治乱警鉴》给予我们的警示,还远远不只这些,我在这里之所以突出地强调上述几点,旨在希望领导干部充分看到《治乱警鉴》的警世作用,以便更好地完成我们肩负的新的伟大的历史使命。因此,我还是《国史镜鉴》序言结束语中的那句话:衷心希望它能够被置于领导干部的案头,认真研究,反复揣摩,使之成为修身治国的座右铭,自励不辍的

警钟,取之丰富的营养剂,以提高领导干部的素质和领导工作水平,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健康发展。是为序。

1996年2月8日

序 言

戴逸

早在三年前，当赵禄祥先生主持编撰《治乱警鉴》刚开始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两位中年学者商传、李世愉先生，曾向我介绍了这部书的内容及结构，引起了极大的兴趣。今天，看了《治乱警鉴》的书稿，真是兴味盎然，不忍释手。这是一部好书。主编赵禄祥先生及全体作者，为弘扬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遗产，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为今人和后人做了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工作。

首先，《治乱警鉴》的选题立意很好。近年来，史鉴著作陆续出版了很多。但是，从治乱的角度总结、研究和分析自先秦至清末几千年的盛衰兴替，为后人提供可资借鉴的通史性巨著，

此前还从未有过。《治乱警鉴》的出版无疑填补了这一空白,其价值的确不可低估。

中国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治与乱作为一对矛盾的社会现象,一直以相互联系、相互排斥、相互制约的形式,伴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又是一部治乱相继、治乱更迭的历史。而治乱的出现与国家的兴衰存亡又是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被后世盛赞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之治、仁宣致治、康乾盛世等,都曾为社会的繁荣和稳定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相反,吴楚七国之乱、八王之乱、安史之乱、三藩之乱,都使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遭到严重的摧残和破坏。历史的教训是极为深刻的。对此,我们的祖先早有这方面的论述。如《尚书·太甲下》称:“与治同道,罔不兴;与乱同事,罔不亡。”《管子·正世》称:“利莫大于治,害莫大于乱。”而荀子的名言“乱则国危,治则国安”^①可视为对治乱与兴衰关系的精辟概括和总结,一直起着警世的作用。历史上的治世与乱世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有其原因可寻。最重要的是人的因素,尤其是统治者、执政者的

^① 《荀子·王霸》。

修养、见识与能力以及社会各个阶级和集团的群体动向。欧阳修总结历史经验说：“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① 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目的是“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②，寓意是教育后代执政者，以安邦定国。因此，重视对治乱现象的分析研究，洞察治与乱的辩证关系，无疑是十分重要的。历史上的许多政治家、军事家，以及有识之士，在总结治乱的经验教训中，不断提醒执政者“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③；“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④；“思所以危则安矣，思所以乱则治矣，思所以亡则存矣”^⑤。

历史证明，只有那些注重寻求导致治乱原因的领导者，才能真正吸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最后达到天下大治。贞观时期的君臣就是典型的例子。唐太宗就清醒地认识到：“天下稍安，尤须兢慎，若便骄逸，必致丧败。”^⑥ 魏征更是明确指出：“自古失国之主，皆为居安忘危，处治忘

① 《新五代史·伶官传序》。

② 《进资治通鉴表》。

③ 《周易·系辞下》。

④ 《左传·襄公十一年》。

⑤ 《新唐书·魏征传》。

⑥ 《贞观政要·政体》。

乱,所以不能长久。”^①正是由于他们有这样的共识,才能君臣一心,孜孜求治,最终在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欧阳修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提醒当时的统治者要“广引深远,以明治乱之原”^②。应该说,这是求治的基础,是达到治世的先决条件。因为只有“明治乱之原”,才能找出防乱求治之术,最终达到太平盛世。欧阳修的话,至今仍有借鉴作用。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治乱警鉴》的选题立意很好。它紧紧抓住了治与乱这个对国家兴衰存亡有着直接影响的社会现象,不仅详细介绍了历代治与乱的过程,以及治乱与兴衰的关系,而且认真分析了造成治或乱的各种复杂的历史原因。它在总结历史经验上是成功的。可以说,它正是一部以生动的史例来“广引深远”,使读者“明治乱之原”的史鉴巨著,定会使读者从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中受到启迪。

其次,《治乱警鉴》的编纂体例新颖独特。它囊括了历史上所有的治世和乱世,而每一治世和乱世都单独命题成篇,全书共计88个篇目。

① 《贞观政要·政体》。

② 欧阳修:《准诏言事上书》。

这些篇目又都按时间顺序排列。这样，它给读者的便是一部完整的、线索清楚的中国治乱兴衰史。同时，每一篇目中都包括了三部分内容，即“治乱纪事”、“人物春秋”、“大事年表”。这种体例既吸收了中国纪传体、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的优长，又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和创新。“治乱纪事”以治乱为线索，以事件为主题，阐明治世或乱世的来龙去脉，分析其原因、后果，给予恰当的评价，指出可资借鉴之处。这一部分是全书的主体，对读者了解中国治乱兴衰史，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可以说是条理清晰，重点突出。“人物春秋”则突出了各式各样的历史人物在治世或乱世所起到的作用。这个内容的设计，使全书锦上添花，大为增色。我在《〈清代人物传稿〉序言》中曾谈到：个人的行动可以在历史上发生巨大的作用，他的意志、才能、性格、作风、爱好，都会影响具体事件的发生、发展，使得历史的过程打上个人品质的印记，而具有特殊的外貌。因此，研究历史人物个人的生活经历、言论行事和品格特征，是历史学家的职责。《治乱警鉴》所记述的历史人物，正是在各自的性格、意志、才能、作风及爱好上下了功夫，定会引起读者的深思，唤起人们对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关注。“大事年表”

则使读者对所记治世或乱世的线索一目了然。这三部分内容有机地融合在一起,的确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

第三,《治乱警鉴》严谨的治学态度值得赞扬。尽管这是一部记史悠长,内容丰富,长达四百万字的史鉴巨著,但从主编到全体作者,始终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坚持从实际出发,详细地占有材料,经过认真研究,力求真实地、客观地反映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既不虚构夸张,又不溢美隐恶,努力做到“求实”和“存真”。这在全书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尤其值得肯定的是,所有篇目都在深入研究论述的基础上进行了精辟的分析,其中相当部分的结论是令人信服的。从这里可以看出主编和作者在“鉴”字上是颇下了一番功夫的,这就使《治乱警鉴》的内容得以升华。所以,《治乱警鉴》虽不是学术专著,但却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和学术价值。此外,在尊重历史、存真求实的前提下,一些篇目还做到了记述生动,文词优美,使科学的内容和优美的形式达到了完美的结合。

第四,《治乱警鉴》编委、作者队伍的组织值得称道。参与《治乱警鉴》编撰工作的编委和作者队伍,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长期从事历

史研究的专家、教授、学者；另一部分是在政府机关和厂矿企业工作多年，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并对政治、经济、历史有一定研究水平的领导干部。所以，《治乱警鉴》的编纂，是史学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在历史研究为现实服务及古为今用的创作上，相互结合的产物。这在当今的史学研究中意义极大，而其产生的影响必将深远。我相信这种结合将有利于历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发展，同时也希望这种结合能创造出更加丰硕的成果。

总之，我认为《治乱警鉴》是一部成就斐然的史鉴巨著，是史学研究为现实服务的可喜成果，值得我们重视和欢迎。

1996年3月10日

自 序

赵祥

(一)

《治乱警鉴》是《国史镜鉴》的姊妹篇。

《国史镜鉴》作为以类分篇列卷的史鉴著作，在其问世并经三次印刷发行后，受到广大读者的热情褒奖。认为它“不仅记史悠长，规模宏大，分类明晰，编纂严谨；而且内容丰富，评述精当，寓意深刻，镜鉴分明”。“是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修身、齐家、创业、建国、安天下的必读之书”。不少资深的历史学家还给予了更多的鼓励和评价，称“《国史镜鉴》是通鉴纪事本末的类编”；“是迄今为止写史记事论鉴比较全面、系

统、完整的一部史鉴巨著”；“是历史研究为现实服务的典范”；“是理论性、学术性、可读性统一的典范”。

《国史镜鉴》的成功，固然有从事编撰工作的专家、教授、学者及实际工作者多年的辛勤耕耘和不懈努力；固然有史学界、出版界和社会各界的大力帮助和支持；固然有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所展现的良好环境，但最根本的还在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本身。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史镜鉴》在弘扬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传统文化传统方面，作了一次带有开创性的、成功的、然而也是初步的尝试。

“鉴以资治”早已成为古人和今人的共识。但如何更好地做到“以史为鉴”，并“以鉴为师”，却是古往今来有识之士一直在研究和探索的课题。毛泽东曾经说过：“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①为了把中华民族历史文化遗产中最珍贵的东西挖掘出来，并从理性上加以认识，在编撰《国史

^①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